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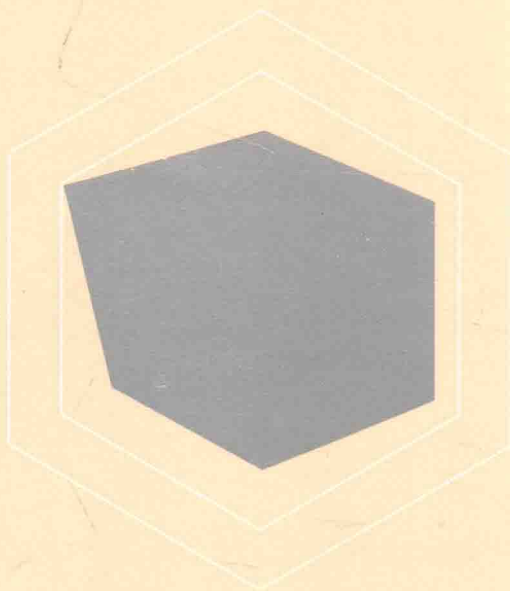
倾向与可能丛书

解放的悖论

世俗革命与宗教反革命

[美] 迈克尔·沃尔泽 著

赵宇哲 译



The Paradox of Liberation

Secular Revolutions and Religious Counterrevolutions

Michael Walzer



创于188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倾向与可能丛书

解放的悖论

世俗革命与宗教反革命

[美] 迈克尔·沃尔泽 著

赵宇哲 译

The Paradox of Liberation

Secular Revolutions and
Religious Counterrevolutions

Michael Walzer



创于188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解放的悖论：世俗革命与宗教反革命 / (美) 迈克尔·沃尔泽 (Michael Walzer) 著；赵宇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ISBN 978-7-100-14665-4

I．①解… II．①迈… ②赵… III．①民族解放运动—研究—世界—现代②宗教社会学—研究—世界—现代 IV．① D062 ② B9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56837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解放的悖论：世俗革命与宗教反革命

〔美〕迈克尔·沃尔泽 著

赵宇哲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

有限公司印制

ISBN 978-7-100-14665-4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张 5.25

定价：48.00 元

**THE PARADOX OF LIBERATION: SECULAR REVOLUTIONS AND
RELIGIOUS COUNTERREVOLUTIONS**

by Michael Walzer

Copyright © 2015 Michael Walzer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Yale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纪念我的朋友与同事

克利福德·格尔茨（1926—2006）

目录

前 言	001
第一章 民族解放的悖论	007
第二章 例释悖论：犹太复国主义与犹太教的对抗	033
第三章 否定悖论：马克思主义视角	061
第四章 民族解放的未来	091
后 记	115
注 释	125
致 谢	147
索 引	151

前言

在本书中，我计划描述民族解放史中的一种反复出现，ix
并且在我看来令人不安的模式。我将会讨论几个事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三个独立国家——1947—1948年的印度和以色列，以及1962年的阿尔及利亚。我关注的是争取国家地位的世俗政治运动，以及大约二十五年之后，挑战这项成就的宗教运动。在第一章中，我会谈及这三场解放运动：印度国民大会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劳工犹太复国主义（Labor Zionism）和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阵线（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简称FLN，以下简称“民解阵”），但我主要会讲“民解阵”。我还会谈及古代以色列人逃离埃及的故事，因为我曾就此发表过一些文章，而这也是西方x
研究者在写到革命和民族解放时普遍参考的内容。如果这并非信史，那也算得上文学中最早有关一个民族从异族统治下获得解放的事例。在第二章中，我将通过自己最熟悉的事例——犹太复国主义及其创立的国家——来审视这种反复出现的模式。在第三章中，我将考察在观察这三个事例时的一

种别样视角，一种主要得到马克思主义者支持的视角。在第四章中，我将提到另一种别样的视角，一种由印度的后殖民研究学者提出的视角。接下来，我将首先认真反思印度，然后反思以色列，以此来反思民族解放到底有没有前途。

xi 我不会把自己将要描述的模式硬说成是普遍的，或在任何情况下都完全一样的。我遵循“在政治中每件事都与众不同”这句箴言，但是一些要素——事件、过程、运动和政权——与其他事类似，认真的比较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同异之处。我曾就自己的计划向朋友和同事们咨询，他们担心其间的差异很大，并让我注意那些与模式不符的例外。例如在印度，有人确切地告诉我，由于“民解阵”建立的国家具有威权主义的特征，阿尔及利亚是个例外——在本书中我接受了与之类似的立场。一些同事和本书最初的读者认为，因为犹太人的流亡，还有过去和现在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争斗，犹太复国主义是个例外。我准备讨论这些问题，但我的主要话题是民族解放本身，以及解放运动的内部关系。在本书中，读者们将会看到，贯穿于这三个事例中的相似之处非常明显。

我要重点强调一下：我的目标是理解，而非科学阐释。我决不认为由这三个事例所构成的模式表达了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万能法则，历史上和现在都有“法则”无法涵盖的事例。实际上，要是单独描述这三个事例，每个都能使我扼要的解释变得极为复杂。在介绍我的主要计划之后，我

将说到一些使问题复杂化的情况。但我相信无论自己的解释多么简单，也对回答一个必要的问题有所帮助：民族解放到底怎么了？

至少在开始时，民族解放非常成功：三个民族确实从异族统治下得到了解放。然而与此同时，现存的国家并非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设想中的国家，而这些国家的道德/政治文化，亦即其内部生活，与发起这三场运动的人所盼望的完全不同。其中的一个差异是我分析的核心，我会不断回归其上：三场运动都是世俗的，而且旗帜鲜明地致力于一项世俗的事业，然而在这些运动所缔造的国家中，一种根植于原教旨主义宗教（这是一种不严格的说法）的政治非常得势。这三个不同的国家有着三种不同的宗教，但发展进程却惊人地相似：大概在独立之后二十到三十年，世俗国家受到了激进宗教运动的挑战。对解放的悖论而言，这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一个核心的特点。

xii

伴随着不同的进程，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其他事例中。在 20 世纪中，世俗政治以两种截然不同的面目出现。第一种公然实行威权主义：俄罗斯的列宁（Lenin）和土耳其的阿塔图尔克（Atatürk）是最主要的代表；埃及的纳赛尔（Nasser）、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Baath Party）则是威权世俗主义后来的例子。阿尔及利亚“民解阵”也可以算在这里面，它在独立后立刻建立的国家里实行一党制，但就算这个政党，旋即为本应受其管控的军队所接管。

xiii 但由于“民解阵”最初在形式上致力于民主，而且其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士为此不懈努力，我选择将其与一贯更为民主的印度和以色列相提并论。我认为，民主和世俗化的结合对民族解放大业至关重要，它是将下文的这些运动称为“解放”运动的关键原因。更确切地说，这是我将它们与其他革命和民主主义运动区分开来的原因，尽管其他运动中后来有一些也受到了宗教的反革命挑战。

本书中的三场民族解放运动都遭到宗教界（和后殖民时代的）批评者的抨击，他们攻击这些运动“西化”。这种指控确实成立。在一些很重要的方面，解放者效法欧洲的左翼政治。由于本人的政治观点也发端于此，所以我并不特别为这种批评所困扰。但它指向了民族解放悖论的另一面：解放斗士反抗帝国主义统治，而他们却和推行这种统治的人在同样的学校里上学，他们看待本民族的视角与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所谓的“东方主义”惊人地相近。这个词与“西化”一样含有贬义，不过“东方主义者”还有不少可取之处，当然他们也有一些不足。民族解放斗士与他们想要解放的民族之间的联系很成问题，这也是之后几章中我论证的核心所在。这就是我所要审视的“内部关系”，它非常有助于解释宗教的反革命。

xiv 我的第一个问题——民族解放到底怎么了？——将我们引向了另一个问题：世俗的民主左派到底怎么了？这才是更深层次的问题（也许我应称之为忧虑），它促使我写这本书。

这个问题超越了我这里的三个事例，但我不想抽象地谈论这个问题。如果抽象的论证超过两三句话，我总会觉得难以为继。我想写得具体一些，印度、以色列和阿尔及利亚有效地展示出世俗左翼在政治霸权和文化重塑上面临的困境。可能还有其他生动的事例。我甚至还可以在谈及美国时讨论这些困境，美国革命尽管不是民族解放斗争，但它生动地展示出致力于世俗化（与半民主）的信念。怀疑重要的世俗左翼力量是否曾存在于我国的读者，应该读一些我国的早期历史。最初的定居者和政治奠基者摆脱了——更准确地说是逐渐开始摆脱——旧世界的宗教势力。在我看来，他们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个世俗国家。在简短的后记中，我会解释为什么代表着 20 世纪事例的悖论没有出现在 18 世纪的美国。这里的论证支持美国例外论，但我对此论证设有重要的限制条件。无论 18 世纪美国人多么例外，我们现在可不那么例外了。

第一章

民族解放的悖论

- 1 民族解放既是一项雄心勃勃的事业，还一直是一项模棱两可的事业。民族不但要从外部压迫中得到解放（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很简单），还要从外部压迫的内部影响中得到解放。突尼斯裔犹太人阿尔贝·梅弥（Albert Memmi）敏锐地描述了外族统治的心理影响，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犹太人需要摆脱“双重的压迫：加诸他们身上的，由不断的侵扰构成的外部压迫、客观压迫，以及后果同样有害的自我压迫（auto-oppression）”。¹二者合流的后果之一就是传统上的精英对本
- 2 国的支配。作为外族统治的居间者，这些男男女女（多为男人）在臣属国和统治者之间忙前跑后，和统治者商讨，必要时向他们行贿，如有需要还得适应他们的苛求，充分利用一种艰难且屈辱的关系。在每一个被外族统治的民族中，都有和“宫廷犹太人”（court Jew）类似的人物，民族解放的目标之一就是消灭这个角色，打垮扮演该角色的人。

但这种双重压迫还有一种更深远的影响需要克服，那就是被统治者的消极、静默和消沉。在外族统治下，或在犹太人那样的流亡中，不去适应条件，不去向当权者求和的民族是无法长存的。早期抵抗的努力已被野蛮地压制下去；之后抵抗会转入地下，在共同的抱怨、嘲讽和回避中表现出来。左翼学者想方设法颂扬这种情况，而这些事也应该得到颂扬。²但更严重、更可悲之事乃是适应（accommodation）——现实中的选择往往不那么诱人。适应的影响或深或浅，这要取决于情况有多严重，以及这种情况要持续几年，几十年还是几百年。在政治生活中，适应的形式多种多样：听天由命的顺从，从政治活动中脱身，移情于家庭或社区，甚至会承认外族统治者在政治上的“优势”。在最后一种情形下，本土文化被看成是不适合政治的，它应致力于追求更高远、更圣洁的事情。“他们”英国人、法国人，所有欧洲人都有从政的天赋，他们具备支配帝国所需的冷酷；“我们”服从，因为我们关注更重要的事情，冷酷与我们格格不入。³

即便是不愿效法帝国主义统治者之冷酷的解放者——比如莫罕达斯·甘地（Mohandas Gandhi）——也相信必须要革除过去的适应性举动，有必要“在自我意识和争取权力上训导群众”。甘地的“建设性项目”着眼于创造“适于”独立的，“能够管理（他们）自己事务”的男男女女——虽说他们不用像英国人那样去管别人。⁴这项任务理应在民族解

放之前完成，但在我所举的例子中，这项任务在独立时都没有完成。解放者的建设性项目从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

- 一旦人民适应了某种形式的外族统治，并针对其进行了各种自我调整，他们可能会用怀疑的眼光看待那些突然冒出来，要给他们带来解放的人们——正如摩西（Moses）向以色列人解释他们即将从埃及人的奴役中获救一样。⁵《圣经》在这里讲述了一个经典的故事，每当满怀激情的青年解放者初次面对他们想要解放的人，并发现他们很害怕、很不情愿时，这个故事就会重现。解放者很快发现，他们需要（用现代的话说）在解放开始之前“提升人民的意识”。

- 除了反对人民目前由压迫和适应而形成的意识之外，这句话还意味着什么？提升意识是一项说服性工作，但很快就会转变成解放者和被其称为传统派之间的一场文化战争。提升意识有可能让事态变得紧张。对于像甘地这样有魅力的领袖，他们有可能让传统文化适应民族解放的需要，但照此而行的适应可能会遭遇激烈的反对，其成就可能也无法长存。甚至连甘地也强烈反对印度文化的很多方面，尤其是“贱民”（untouchables）的待遇。后来他被人暗杀，凶手秉承一种更为刻板、传统、可能更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印度教。⁶

我从民族主义的历史中选出了这个例子和其他的例子，但我要强调，民族解放只是这段历史的一个分支、一部分，而非全部。实际上，解放者的计划看上去有悖于《韦氏英语词典》对民族主义的定义：“一种将一个民族抬高到其他民

族之上的民族意识，其首要重点是促进自身——而非其他民族的——文化和利益。”⁷ 在一切民族解放运动中，一定都会有这样的人——他们构成了运动的右翼。对他们而言，民族主义是零和博弈。但是解放运动领导者的“首要重点”在两方面有所不同：首先，对于其他民族，他们想要取得的是政治平等，而非统治地位；第二，他们想要将自己的民族从长久以来威权主义和被动消极的传统中，就是从自己的历史文化中解放出来。解放更接近革命政治，而非民族扩张。像解放斗士一样，革命者将自身置于现有的服从、适应和（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伪意识”的对立面上。他们要求一种激进的转变。社会革命需要与现存的社会斗争；民族解放需要与现存的国家斗争，而非“抬高”现存的国家。

6

这通常也是反宗教的斗争，因为正如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所言，宗教宣扬的是“一种服从主流社会秩序、安于现状的哲学”。⁸ 尼赫鲁在此复述了解放运动的观点，该观点源自一个事实，即适应外族统治的举动通常带有宗教色彩，而这部分出于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无论现世多坏，彼岸世界的慰藉常在。但如果民族解放中的世俗化斗士将宗教的慰藉仅仅描绘成空中楼阁，那他们就错了。宗教也会让人产生翻转和胜利的幻想，进而会断断续续激起信仰复兴和千年盛世（millenarian）的渴望，但这些伴着喧嚣的运动往往没有效果。⁹ 千年盛世的思想看似是在反抗异族统治，短时间内有可能确实在反抗，但长远来看它是一种政